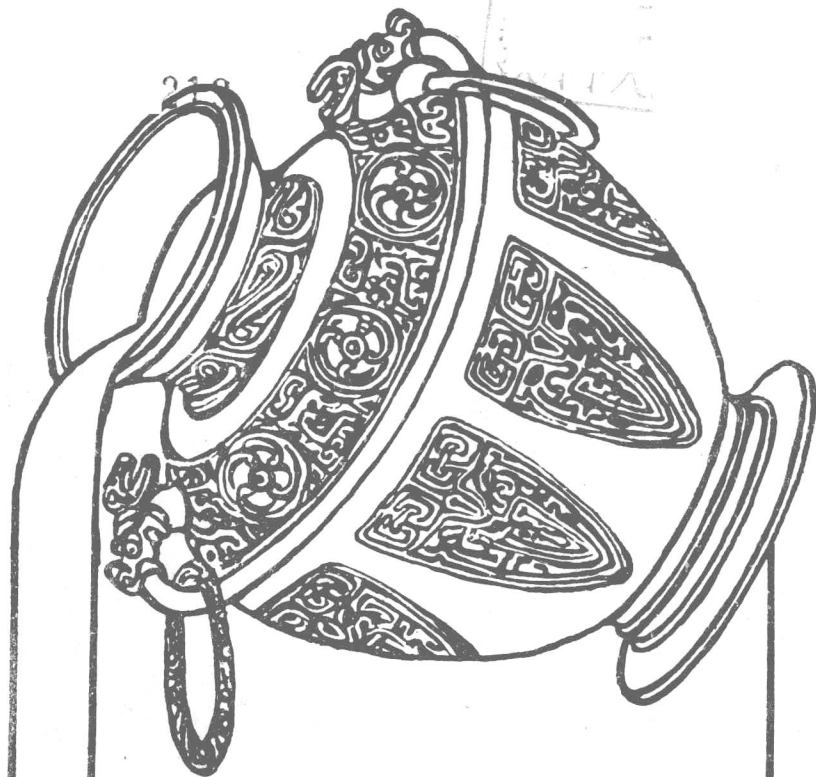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

大城小調

東京夢華錄



東京夢華錄

大城小調

一個中國古典知識 大衆化的構想

許多討論或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大概都承認一樁事實：中國文化的基調，是傾向于人間的，是關心人生，參與人生，反映人生的。我們的聖賢才智，歷代著述，大多圍繞着一個主題，治亂興廢與世道人心。無論是春秋戰國的諸子哲學，漢魏各家的傳經事業，韓柳歐蘇的道德文章，程朱陸王的心性義理，無論是貴族屈原的憂患獨嘆，樵夫惠能的頓悟衆生，無論是先民傳唱的詩歌、戲曲、村里講談的平話、小說……等等種種，隨時都洋溢著那樣強烈的平民性格、鄉土芬芳，以及它那無所不備的人倫大愛，一種對平凡事物的尊敬，對社會家國的情懷，對蒼生萬有的期待，激蕩交融，相互輝耀，繽紛燦爛的造成了中國。平易近人、博大久遠的中國。

可是，生爲這一個文化傳承者的現代中國人，對於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胸懷天下的文明，這樣一個塑造了我們、呵護了我們幾千年的文化母體，可有多少認識？

多少理解？又有多少接觸的機會，把握的可能呢？

一般社會大眾暫且不提，就是我們的莘莘學子，讀書人，受了十幾年的現代教育以後，究竟讀過幾部歷代的經典古籍？了解幾許先人的經驗智慧？當年林語堂先生就曾感嘆過，現在的大學畢業生，連「中國幾種重要叢書都未曾見過」，遑論其他？

特別是近年以來，電視、電影和一般大眾媒體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個畸形文化當道，社會價值浮動的生活形態。西方一位著名學者雷文孫所說的當代世界是一個「沒有圍牆的博物館」，固然鮮明了這一現象，但真正的問題，却在于我們的根性尚未扎穩，就已目迷五色的跌入了傳播學者所批評的「優勢文化」的輻射圈內，失去了自我的特質與創造的能力。

何況，近代的中國還面對了內外雙重的文化焦慮。自內在而言，白話文學運動固然開發了俚語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眾文學的地位，覺悟到社會群體的知識參與力，却相對的減損了我們對中國古典知識的傳承力，以往屬於孩童啟蒙的「小學」教育，屬於讀書人必備的「經學」常識，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動下，變得無比艱澀與隔閡了。自外在而言，五四以來的西化怒潮，不斷開展了對西方經驗的學習，對傳統意識的批判，意興風發的營造了我們的時代感覺與世界精神，為我們的現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礎，它也同時疾風迅雨般冲刷着中國備受誤解的文明，削弱了我們的文化認同與歷史根源，使我們在現代化的整體架構上模糊了着力的點，漫漶了精神的面。

幾十年前，國際聯合會教育考察團在一份報告書中曾一針見血的指出：歐洲力量的來源，經常是透過古代文明的再發現與新認識而達至；中國的教育也理當如此，

才能真實發揮它的民族性與創造性。

事實上，現代的學術研究，也紛紛肯定了相似的論點。文化人類學所剖示的，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的殊異性與持續性，知識社會學所探討的，一個文化的強大背景與典範人物，常常是新一代創造者的「支援意識」的能源；而李約瑟更直截了當的說，除了科技以外，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沒有普遍性的。在這裡，當我們回溯了現代中國的種種內在、外在與現實的條件之余，中國文化風格的深透再造，中國古典知識的普遍傳承，更成了炎黃子孫無可推卸的天職了。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的編輯印行，就是這樣一份反省與辨認的開展。

在中國傳延千古的史實里，我們也都看到，每當一次改朝換代或重大的社會變遷之余，都有許多沈潛會通的有心人站出來，顛沛造次，心志不移的汲汲興滅繼絕的文化整理、傳道解惑的知識普及——孔子的匯編古籍、有教無類，劉向的校理衆書、編目提要，鄭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經，乃至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朱熹的「四書集注」，王心齊的深人民衆、樂學教育……他們或以個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動，分別爲中國文化做了修舊起廢、變通傳承的偉大事業。

辛亥革命以來，也有過整理國故的呼吁、讀經運動的倡行，商務印書館更曾經編撰印行了相當數量、不同種類的古書今釋語譯。遺憾的是，時代的變動太大，現實的條件也差，少數提倡者的陳義過高，拙于宣導，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學術界或知識分子的需要，這一切，都使得歷代經典的再生，和它的大衆化，離了題，觸了礁。

當我們着手于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們一方面感動于前人的努力，一方面也考慮了當前的需求，從過去疏漏了的若干問題開始，提出了我們這個中國古典知識大衆

化的構想與做法。

我們的基本態度是：中國的古典知識，應該而且必須由全民所共享。它們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也不是少數學人的獨寵，我們希望它能進入到大衆的生活里去，也希望大衆都能參與到這一文化傳承的事業中來；何況，這些歷代相傳的經典，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那么大的生活意義——說得更澈底些，這類經典，大部份還是平民大衆自身的創造與表現。大家怎么能眼睁睁的放弃了這一古典寶藏的主權呢？爲此，我們邀請的每一位編撰人，除了文筆的生動流暢外，同時希望他能擁有古典的與現代的知識的專家、學者，對當前現實有一適當的理解與同情。在這個基礎上，歷代經典的重新編撰，方始具備了活潑明白、深入淺出、趣味化、生活化的蘊義。

也是爲此，我們出版這套書，除了面向多層次的讀者外，還有考慮到青少年讀者。畢竟，這是一種文化扎根的事業，扎根當然是愈早愈好。在最有吸收力、閱讀力的年歲，在最能培養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時候，我們的青少年朋友就能與這些清澈的智慧、廣博的經驗爲友，接觸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創造，而我們所謂的「中國古典知識大衆化」，才不會是一句口號。

這也意味了我們對編撰人寫作態度的懇盼，以及我們對社會群體的邀請。但願透過這樣的方式，讓中國的知識、中國的創作，能够回流反哺，回到每一個中國家庭里，使每一位具有中學文化程度以上的中華子民，都能喜愛它、閱讀它。

我們深深明白中國文化的豐美，它的包容與廣大。每一時代，每一情境，都有不同的創作與反省，它們或驚或嘆、或悲或喜，或溫柔敦厚、或鵬飛萬里，雖然形式多端、訴求有異，却絲毫無損于它們的完美與貢獻。這也就確定了我們的選書原

則：盡可能的多樣化與典範化。像四庫全書對佛典道藏的排斥，像歷代經籍對戲曲小說的貶抑，甚至多數人都忽略了的中國的科技知識、經濟探討、敦煌遺墨，都是我們所不願也不宜偏漏的。

就這樣，我們在時代意義的需求、歷史價值的肯定、多樣內容的考量下，從二十五萬三千余冊的古籍舊藏里，歸納綜合，選擇了目前呈現在諸位面前的四十五部經典。這是我們開發中國古典知識能源的第一步，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繼續跨出第二步、第三步……

我們所以採用「經典」二字為這四十五部書的結集定名，一方面是——說文解字所解釋的，「經」是一種有條不紊的編織排列，廣韻所說的，「典」是一種法，一種規則。它們的交織運作，正可以系統的演繹了中國文化的風格面貌，給出我們日常行為的規範，生活的秩序，情感的條理。另一方面——也是採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說法：它們是「當代記述較多而常要翻閱的」一些書。我們相信，中國文化的恢宏壯麗，必須在這樣的襟懷中才能有所把握。

與這個信念相表里，我們在這四十五部經典的編印上，不作分類也不予編號。這套經典對我們是一體同尊的，改寫以後也大都同樣親切可讀，我們企翼于提供的，是一套比較完備的古典知識。無論古代中國七略四部的編目，或現代西方科技分類的正名，都易扭曲了它們的形象，阻礙了可能的欣賞，這就大大違反我們出版這套書的諦旨了。

但在另一種意義上，我們却分別為舊典賦予了新的書名，用現代的語言烘托原書的精神，增進讀者對它的親和力；當然，這也意味了它是一種新的解釋，是我們以現代的編撰形式和生活現實來再認的古典。

也是在這種種實質的、閱讀的要求下，我們不得不對原書有所去取，有所融匯與變通。譬如，原典最大的「資治通鑑」，將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本身就是一個雄偉的書中帝國，一般大眾實難輕易的一窺堂奧。新版的「帝王的鏡子」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形式也類同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的體裁，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寫，雖然字數濃縮了，却在不失原典題旨的照顧下，提供了一份非專業的認知。其他的部份經典，也有類似的寫法。這方面，歐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們借鑒的例子。遠的不談，就以湯恩比的「歷史研究」來說，前六冊出版了未及十年，桑馬威爾就為它作了濃縮至六分之一的大眾節本，暢銷一時，并曾獲得湯氏本人的大大贊賞。我們的作法雖不必盡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

再如原書最少的老子「道德經」，這部被美國學者蒲克明肯定為未來大同世界家喻戶曉的一部書，短短五千言，我們却相對的擴充、闡釋，完成了十來萬字的「生命的大智慧」。又如「左傳」、「史記」、「戰國策」等書，原有若干重疊的記述，經過編撰人的相互研討，各有刪節，避免了雷同繁復。……由于歷代經典的繽紛多彩，體裁富麗，筆路萬殊，各編撰人曾有過集體的討論，也有過個別的協調，分別作成了若干不同的體例原則，交互運用，以便充分發揚原典精神，又能照顧現實需要，為廣大讀者打出一把把邁入經典大門的鎖匙。

無論如何，重新編寫后的這套書，畢竟仍是每一位編撰者的心血結晶，知識成果。我們明白，經典的解釋原有各種不同的學說流派，在重新編寫的過程里，每一位編撰者的參酌採用，個人發揮，我們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

除了經典的編撰改寫以外，我們同時收集了各種有關的文物圖片千余幅，分別編入各書。在這些「文物選粹」中，也許更容易讓我們一目了然的感知到中國；那

樣樸素生動的陶的文化，剛健恢宏的銅的文化，溫潤高潔的玉的文化，細致優美的瓷的文化，那些刻寫在竹簡、絲帛上的歷史，那些遺落在荒山、野地里的器物，那些意隨筆動的書法，那文章、那繪畫……正如浩瀚的中國歷代經典一般，那一樣不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那一樣不是先民們偉大想像與勤懇工作的結晶？看起來，它們是一幅幅獨立存在的作品，一件件各自完整的文物，然而它們每一樣都代表了中國，都煥發出中國文化綿延不盡的特質。它們也和這些經典的作者一樣，是彼此相屬、相生、相成的。

這套書，分別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華，不只是強調原典的不可或廢，更在于牽引有心的讀者，循序漸進，自淺而深。但願我們的讀者，在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之余，更能一層層走向原典，去作更高深的研究，締造更豐富的成果；上下古今，縱橫萬里，為中國文化傳香火于天下。

是的，我們衷心希望，這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的編印，將是一扇現代人開向古典的窗；是一聲歷史投給現代的呼喚；是一種關切與擁抱中國的開始；它也將是一盞盞文化的燈火，在漫漫書海中，照出一條知識的，遠航的路——

也許，若干年后，今天這套書的讀者里，也有人走入這一偉大的文化殿堂，與先聖先賢并肩論道，弦歌不輟，永世長青的開啓着、建構着未來無數個世代的中國心靈！

歷史在期待。

一九九二年十月

文物選粹

九

原著者簡介

二五

編撰者簡介

二六

致讀者書

二七

第一篇 前言

一

一、作者與書

三

二、東京開封

九

第二篇 城門與河橋

一九

一、東京的新城與舊城

二一

二、河道及橋

三七

第三篇 皇城與政府

四九

一、大內皇城

五一

二、內、外諸司各機構

七一

三、軍隊的概說

八七

第四篇 街景與市容

九三

一、御街及宣德樓前的街道建築

九五

二、朱雀門外街巷

九九

三、東角樓與潘樓東的街巷

一〇五

四、右掖門外及州橋東面的街巷

一一一

五、相國寺的內外

一一六

六、宮寺廟宇

一二三

七、醫鋪及其他

一二八

第五篇 飲食與生活

一三三

一、夜市及酒樓

一三五

二、飯館店攤及飲食

一四一

三、雜賣及其他行業

一五一

四、伎藝的特寫

一五六

五、民性與習俗

一八〇

第六篇、官方的節慶和儀衛

一九九

一、儀衛及皇室出行

二〇一

二、元月的節慶

二〇六

三、淡淡的三月天

二二三

四、皇帝的生日

二四九

五、寒冬的大禮

二六六

第七篇 民俗與節日

二八一

一、春的氣息

二八三

二、夏日寂聊

二九五

三、秋興正濃

三〇五

四、冬年歲暖

三一四

原典精選

三二一

一、宋徽宗艮嶽記

三二三

二、教坊樂部

三二七

三、圓社摸場

三三〇

四、小說

三三三

五、大起居

三三五

六、宋史禮志中所記天寧節上壽儀

三三八

第一篇 前言



一、作者與書

東京夢華錄又簡稱爲夢華錄，或者稱爲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幽蘭居士是作者孟元老別號。作者的生平已無可考，本名也不能確知，「元老」可能是他的名字或者只是字。根據清代藏書家常茂徠的推測，認爲作者即是宋徽宗時的戶部侍郎孟揆，他是當時首都一大名勝「艮嶽」的督造人。原來北宋時道教發達，宋徽宗更是崇信道教，故而接受道士的風水說法，在京城上清寶籙宮之東築了一座假山，名爲「萬歲山」；因山在「艮」方，故而又叫「艮嶽」了。「艮嶽」建於宣和的壬寅年，即宣和四年（一一二二年），徽宗還親自寫了一篇紀念的文章「艮嶽記」（參見附錄一）。以夢華錄的內容來看，作者詳細地記載了北宋首都汴京（開封）的建築、街市、名勝，以及官方的機構、慶典等等；對於一些宮廷的生活、儀典也非常熟悉，應可以約略推知作者的身份與職掌。那麼像「艮嶽」這樣著名的勝蹟何以隻字不提？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因爲宋徽宗生活享受，當時有個名作朱勔口一巧的官員，爲了迎合徽宗的慾望，採盡天下各地的花石來進貢，運送這些花石

的船隻，舳舻又鱗次相望，號稱爲「花石綱」，並且還特別在蘇州設了機構叫「應奉局」的來負責其事，這種花石之役使江浙一帶的百姓受害最深，怨聲載道而恨不得食朱勔之肉，這也曾引起地方上的叛亂。

「艮嶽」就是用花石所築，在這種背景之下的「罪蹟」，必爲天下後世所指責，故諱而不提，企圖隱藏起來。根據這種推測，孟元老似乎就是孟揆了，不過卻沒有其他的證據來支持這種推測，因此只能備爲一說，暫且存疑吧！

本書寫成於紹興丁卯年，也就是南宋初期的高宗時代，紹興丁卯是十七年（一一四七年），距離北宋滅亡約二十一年，作者就是追寫北宋末年首都的情形，而大多是徽宗崇寧到欽宗靖康（一一〇三——一二七）年間的往事。

書的內容包羅了許多方面，有形形色色的商店、街景、酒樓、飯店、攤販等，穿着、飲食、娛樂也有極詳細的描寫。又因爲是當時中國的首都之故，所以宮廷中部份的生活情形，以及朝廷的一些慶典活動，自然也免不了要呈現出來，同時對中央政府各機構的分布位置，門樓市區之規劃等等，在書中也有相當詳細的記錄。雖然這些都是採用回憶錄式的敘述，像雜記體裁般的，但卻能突現出那一時期首都的商品經濟、國民生活等，也就是重新建構了近千年前中國社會面貌中的一個城市造

型。

在學術上而言，本書反映了一個歷史時期的城市社會生活，而且有更活潑、豐富的面貌，成為有關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方面的重要文獻，至少有關中國商品經濟上昇時期的社會經濟情況，新興的市民階層的物質生活、文化生活等狀態，都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史料。

爲了進一步了解作者寫這本書的心意，現在不妨來看看他在書前所寫的序文，他的自述是這樣的：

我幼時隨着先人在各地作官的機會，而游歷了南北各地，在崇寧的癸未年（一一〇三年）到達京師，卜居於城西金梁橋西夾道的南方。而後漸漸長大成，當時正在長期的太平日子之中，物資豐富，人物繁盛，孩童們喜學歌舞，老年人安穩度日，而不識干戈爲何事。由於時節的不同，就有各種各樣的景色，有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等等節慶宴遊之景。若從城中舉目望去，是青樓畫閣，繡戶珠簾，華麗的車子排滿了街頭，名貴的馬匹絡繹不絕地跑在路上，放眼是耀目的一片金翠，鼻嗅的盡是羅綺的飄